珍珠港事件的内幕

[美国]埃德温·马勒
冯之丹　译

1941 年 12 月 7 日 8 时 10 分,一封明码电报"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转到美国海军部,海军部长诺克斯惊呼:"这不是真的,这一定是指菲律宾。"

由于存在麻痹思想,美军战备相当松懈,致使日本空袭成功。随着珍珠港上空巨大黑色烟幕的升起,日本的战略意图得到了实现,它象征着日本的战术胜利和美国的一场悲剧。

本文讲述了在这个人所共知的事件背后那不为世人所知的起因——日本的偷袭竟是美军自己的一场军事演习的真实再现。它撩开了珍珠港事件的一层面纱。难怪明码电报会明确写出:"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人都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按照一个老谋深算和精心安排的计划行事的。但是,在美国海军界以外,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计划并非构思于东京,而是产生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海军作战计划署。

故事可以追溯到 1932 年的 1 月。我们的一支由近二百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到那时为止,也许是海军力量最大规模的集结)云集于加利福尼亚海域,举行一次考验珍珠港防卫能力的演习。舰队的一部分将发起“攻击”;而另一部分,加上港口的陆军卫戍部队,将进行防御。

担任攻击任务的舰队,改变了老一套的海军战略,舰队把所有耀武扬威的战列舰和巡洋舰留在后面,而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在四艘驱逐舰护航之下疾驶穿过东太平洋。海军上将赫·伊·雅奈尔自己是在“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而不是在一艘战舰上),指挥着一个崭新的名为“特遣舰队”的海军群体。这位海军上将是一个热心于航空的军官,他曾经随同他所指挥的一些飞行中队做过许多次飞行,这在当时的海军中是颇不寻常的。现在,他正执行着这项新的航空母舰攻击战略,去袭击一个他在空中早已熟悉了的目标。

珍珠港的防务,在计划中首先是对付海军的进攻。这个任务委托给了保护通向岛屿航道的一支舰队、港口里的一个潜水艇分遣队以及在海岸上的一个陆军满员师和高度密集的沿岸重炮群,这些重炮能够凭借设计完善的铁路和公路系统,迅速移动。另外还加上空中防御

——高射炮炮群、一百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正如雅奈尔海军上将所盼望的那样,他在距离瓦胡岛只有二十四小时航程的时候遇上了阴霾天气,使得负责防卫的舰队难于发现他的行踪。两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在大洋上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特别是当防卫者正在期待着一支庞大舰队前来进犯的时刻,更是如此。没有人发现它们。

星期六(2 月 6 日)薄暮,这些舰只已到达靠急速行驶到黎明时分即能进入瓦胡岛的这样一个位置。雅奈尔海军上将料想,在星期天的清早,防卫部队的警惕性总是要比平时差一点。

当夜幕降临,特遣舰队熄灭一切光亮,无线电保持缄默,它迎着阵阵暴雨、低沉的乌云和正在兴起的海风,全速行进在大海上。这是可以避免被人发现的理想的气候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气候下,舰上的飞机能否起飞呢?驱逐舰甲板上的栏杆都被阵阵海水浸泡,即使巨型航空母舰也在大海里剧烈地摇晃着。

雅奈尔海军上将一直等到黎明前半小时、距瓦胡岛六十英里的时候,才让他的飞机起飞。突然间在漆黑的夜空中,一百五十二架飞机神速地飞离了颠簸在汹涌的大海上的母舰。

这个对珍珠港的第一次飞机袭击,来自东北方向。九年以后,日本对珍珠港的致命的袭击,也正是这样进行的。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信风从东北方向徐徐地吹向两千八百米高的古娄山脉,在那里散发掉它的湿气。这可以说是为进行攻击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条件。因为,机群能够隐藏在像高空屏障的雨云层里,悄悄地接近目标。然后,在防卫者能够起而截击之前,这些机群就突然出现在珍珠港晴朗的上空。

这就是 1932 年 2 月 7 日(星期天)所发生的事情。从“萨拉托加”号

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起飞的轰炸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在云层中突然出现时,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基地在它们俯视下,处于束手无策的困境。每个机群都有自己特定的任务。战斗机用模拟机枪射击,“敲掉”所有地面上的飞机,在这场袭击中没有一架防卫飞机能起飞迎击。同时,其他的机群投下它们的象征性的炸弹,炸毁军事设施或者“炸沉”在港口的所有假想的军舰。

攻击者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如果我们的全部舰队当时真的停泊在港口,而雅奈尔海军上将的飞机也都是带的真炸弹,那么,这些飞机早就能够把每一艘舰艇击沉或者毁坏了。

海军指挥官们对这场象征性的毁灭,在现场进行了“评议”。在那里开了头的讨论,以后在整个海军界到处都在继续探讨。对于许多战略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推翻一切现存的海军作战概念的某种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总有一些人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太以为然。他们说,这主要是由于突然攻其不备的缘故。诚然,如所预见的那样,防卫者在那个星期天早晨确是有点警惕不足,可是看来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即使他们那时十分警惕,也不可能有效地对付这次偷袭。

一些高级军官要求修正海军所赖以建立的全部基础。他们发展了一种革新的思想,主张海军应以空中力量为主,以战舰和其他水面船舰为辅,不应该以战舰为中心来组织海军,而把空军当作一种支援力量。不幸的是,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引起注意。

说没有引起注意,那只是在华盛顿。因为在珍珠港现场进行的“评议”,并非是对这次演习的仅有的一次评论。美国海军方面现在知道,在美国举行演习后不久,东京方面就进行了另一次“评议”。

当我们的飞机进行模拟攻击的时候,瓦胡岛上高效率的日本间谍

组织,对这个岛的所有制度点都派出了观察员,他们每一个人都编造了一个要在那里逗留的言之成理的借口。在沿着港口的茂密的灌木丛里,也有许多这样的观察者。小舢板也在近海“打鱼”。事后,在檀香山只要有海军人员聚集的地方,就有偷听者出现。

在东京,经过精心而深入的研究之后,所有这样获得的情报成为一系列秘密演习的基础。我们现在知道,日本的海军专家们,同我们一些海军将领们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海军最主要的武器是空中力量,一支舰队的打击力量应当围绕它的空中力量而不是围绕水面舰只进行建设。就这样,日本人从我们的演习中,学到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将领们所拒绝学习的东西,日本海军从根本上进行了改建。

日本人进一步认识到,可以一举使大部分美国舰队报销的既光辉而又可行的一个计划,已经送上门来。他们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执行了这个计划。

12 月 8 日,曾经在 1932 年从我们“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上驾机起飞的一些空军军官们,读到有关日本袭击报道的细节时,有如哑巴吃黄连,满不是滋味。可不是吗——这样一下,再这样,又那样,千真万确,正和我们自己九年前在演习中所做的一模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人在 12 月 7 日所遇到的问题,比那次演习要困难得多。从理论上讲,防御力量比过去强大了,侦察来犯敌机的设施那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由于我们缺乏警惕性,当日本飞机突然从古娄山脉的云幛中钻出来的时候,我们竟毫无戒备。

从另一个角度看,事情又变得比过去更容易一些。飞机一架接一架地停在那里,非常容易遭到猛然袭击,而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的战舰,也都停泊在港湾里。

珍珠港的悲剧打破了海军作战的陈旧布局。正巧在 12 月 7 日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天,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停泊在珍珠港。于是,迫于需要,航空母舰的特遣舰队就成了我们主要的海军武器。我们几乎立即开始以远比日本为高超的技能,来使用航空母舰——不论是在珊瑚海、中途岛、拉布尔港或是在马绍尔群岛和特鲁克群岛。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最后解决”

[德国]鲁道夫·霍斯
温华 译

鲁道夫·霍斯(1900～1947),1922 年霍斯成为一名纳粹,而非家人所希望的天主教神父。1933 年加入党卫军。1940 年成为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司令,致力于用毒气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吉卜赛人和其他无辜人民,战后被波兰法庭宣判绞死在奥斯维辛。经人说服,鲁道夫·霍斯在狱中写下了自己的经历,1951 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的回忆录》出版。在本文节选的这一部分中,霍斯对集中营里犹太人的表现进行了一些歪曲,而且一再强调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对这场人间地狱般的灾难并不负有完全责任,以此为自己的罪行开脱。但我们仍能从文中看到集中营里灭绝人性的暴行,感觉到纳粹恶魔般的疯狂。

依照党卫军头领的意志,奥斯维辛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种族灭绝中心。

1941年夏,希特勒亲自下令让我在奥斯维辛准备大屠杀的设备。实施屠杀时,我一点不知道它们的规模或结果。这个命令当然是怪异而恐怖的,但对我来说,屠杀计划背后的原因似乎是正确的。那时我对这一点并无反应。我只知道,接受了一个命令,就必须执行它。至于大屠杀是否必要,我不允许自己有什么看法,因为我缺乏足够的视野。

如果是元首自己下达了"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的命令,那么,对于一个老民主社会党员和一名党卫军官员来说,认为此命令正确是毫无问题的。"元首下令,我们执行"绝不仅是一个句子或口号,它是出自一腔"赤诚"。

自从我被捕以来,人们一再对我说,我可以违背这个命令,甚至可以暗杀希姆莱。我相信,在全体党卫军几千名军官里,没有一个人敢产生这样的想法。这完全不可能。当然了,很多党卫军军官抱怨来自元首的一些残酷命令,可他们又总是照常执行。

元首的很多命令深深地激怒了他的大批军官,但我可以绝对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敢举起手来反对他,甚至在最隐秘的内心深处,连想都没想过要这样做。因为作为元首,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他以元首名义发出的命令,是神圣的,是不容许质疑、考虑和解释的。

他们必须无情地实施,不考虑后果。即使这些命令可能意味着那些军官的死亡。战争期间,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少军官的身上。

在培养自我牺牲精神时,为国家和天皇而战的日本人被树立为党卫军的光辉榜样,他们也将元首奉为神明。

党卫军的培训不像大学课程,后者对学生的影响短暂得就像水流滑过鸭背。前者却正相反,深入人的骨髓。元首非常清楚,他可以要求手下人做些什么。

局外人无法理解,没有一个军官敢违抗元首的命令,更不要说因为命令本身的残酷而干掉他了。

元首,或者他的二把手——党卫军头目们的所有命令是永远正确的。

民主的英格兰也有一个基本的民族信念:"只要是为了国家,无所谓对与错。"每一个有民族意识的英国人都坚持这一点。

犹太人大灭绝开始之前,几乎所有集中营里的苏联红军政委在1941~1942年间都被清除了。

遵照希特勒签发的一个密令,这些苏联红军政委由盖世太保专门从所有战犯营中搜寻出来,一经确认身份,就被转运到最近的集中营清洗掉。

确认身份的苏联红军政委被带到奥斯维辛处决,小批运来的被行刑队解决。

当我还在外执行公务时,我的副手弗里特兹,保护性拘留营的司令,首先尝试了毒气屠杀。毒气原料是一种氩氰酸制剂,曾在拘留营作为杀虫剂使用,我们手头一直有储备。我一回来,弗里特兹就向我汇报了。毒气开始在下一批犯人身上使用。

释放毒气在二号楼禁闭室进行。我戴着防毒面具,亲自观看了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杀的全过程。在拥挤的房间里,死亡在毒气进入房间的同一时刻降临。一声短促的几乎是窒息的叫喊,然后一切就结束了。经历第一次毒杀时我并未完全认识到所发生的一切,也许因为整个过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不久后在老火葬场屠杀了九百个苏联人。一批批苏联犯人被运来,并命令他们在前厅脱光,然后安静地走进太平间,因为他们被告知要‘ 除虱子 ”。运来的人恰好填满了太平间。然后门被封上,毒气从屋顶的洞上弥漫而下。我不知道这次屠杀花了多长时间。有一小会儿,可以听到一种嗡嗡声。药粉洒进去时,有人喊“: 毒气 !”之后是高声惨叫,被困的囚犯们用身体猛撞房门,但门锁上了。那次,我第一次看到了被毒死人的尸体。

屠杀场景让我不舒服,让我打冷颤,虽然我已想到过毒气致死可能比所见的更惨。我一直认为,受害者会体验可怕的窒息感。但那些尸体无一例外地没有抽搐的迹象。医生解释说,氩氰酸对肺有种麻痹作用,其作用迅速强大,在抽搐出现之前死亡已然降临。它的作用不同于一氧化碳或普通的缺氧产生的效果。那时,屠杀这些苏联战犯并未使我特别注意。屠杀命令已经下达,我必须得执行,我不得不承认这种毒气设施让我大为宽心,因为大规模屠杀不久就要开始,而当时艾克曼和我都不清楚到底该怎么进行。要用毒气,但我们不知道用哪种,怎么用。现在我们有了毒气,还确立了一套程序。用射击实施屠杀的景象总是让我发抖,因为我想到了那巨大的数量,还有妇女和儿童。击毙人质和集体屠杀已经让我受够了。现在,想到我们将因毒气而免掉所有血腥,犯人们在最后一刻也将免遭折磨,我觉得安慰。当我听过艾克曼叙述犹太人被持机枪和手枪的特别方队撂倒的景象后,我最大的担心就在这里。据他说发生了许多恐怖的场面,被射中之后人们还在逃跑 结果伤者尤其是妇女和孩子的情景,让许多突击队员

因无法再忍受而自杀,甚至还有些人发了疯。大部分突击队员行刑时不得不依赖酒。按照胡佛的描述,行刑队消耗的酒数量惊人。

1942 年春,第一批被指定要屠杀的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运来了。他们从站台上被押到“别墅”——一号掩体——穿过后来建起二号楼的那片草地。人群由奥姆尔和帕里斯克及几个分队头领指挥,他们和犹太人谈些日常话题,询问他们的身份和职业,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一到“别墅”,他们就被要求脱掉衣服。开始,他们平静地走进“消毒室”,但有些人显出惊慌的样子,谈到窒息,一种恐慌立刻出现了,所有还在外面的犹太人马上被推进房间,房门被锁紧。在以后运来的人中,个别难对付的被提前挑出,认真监督,一有异常迹象,那些人就被悄悄带到大楼后面,用小口径步枪击毙。其余的人对此毫无察觉。特别分队① 的出现和他们的平静举止安慰了那些对将要发生什么有担忧或猜疑的人。特别分队成员陪着他们一起进入房间,一直待到最后一刻,起到了更好的安抚作用。一名党卫队队员站在门口,直到屠杀结束。

至关重要的是:运送犯人和脱衣裳的整个过程应当在尽可能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不愿脱掉衣服的人必须让他的同伴或特别分队的人帮忙。

那些执拗的被安抚平静,在鼓励下脱掉衣服。特别分队的犯人保证脱衣过程迅速完成,以致当事人没时间去猜疑发生了什么事。

最引人注目的,是特别分队鼓励他们脱衣服,并带领他们进入毒气室时给予的那种热切帮助。我从未听说也未见过分队的任何一个成员给这些将被毒死的人以最轻微的暗示。相反,他们竭尽全力欺骗

① 由所谓“听话”的犹太囚犯组成。

这些人,尤其要安慰那些多疑的人。尽管后者拒绝信任党卫军,却完全相信自己本民族的人。

他们在集中营里谈起生活,大多数人问起先到的亲朋的消息,听到特别分队那么肯定地说出谎言,看到他们的手势,是很有趣的。许多妇女把孩子藏进衣服堆里,特别分队的人会格外注意检查这种举动,然后说些鼓励的话,直到说服她带上孩子。那些妇女认为"消毒"可能对小孩子没好处,因而试图藏起来。

幼小的孩子通常要哭闹,因为被这样脱光衣服很奇怪,但当他们的母亲或特别分队的人安慰之后,他们会平静下来,带着玩具进入毒气室,和别的孩子玩耍、嬉戏。

我注意到,那些已经猜到或知道等待她们命运的女人们却有勇气与孩子们开玩笑来鼓励他们,尽管在她们自己眼里,可以看到致命的恐惧。

一个女人走向毒气室时朝我走来,她的几个孩子正在帮最小的一个跨过粗糙的地面。她指着孩子低声说:"你怎么能杀死这么漂亮可爱的孩子?你难道根本没有心吗?"

一个老人走过我面前,轻声说:"德国要为这次大屠杀付出沉重代价。"他说话时眼睛因仇恨而燃烧,但他平静地走进了毒气室,并不为他人担心。

一个年轻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四处张罗,帮小孩脱衣,在挑选中,她带上了两个孩子。她那焦躁的举动和表情立刻让我注意上了。她看上去一点不像犹太女人,当她的孩子已不和她一起了,她还一直等到最后,帮助那些还没脱好衣服或孩子多的妇女,鼓励她们,安慰孩子。她最后一个走进毒气室并站在门口说:"我一直明白我们将要被带到奥斯维辛毒死,挑选开始时我放弃了做劳动力,因为我希望

照顾孩子们,我想经历全过程,完全清醒地面对一切。但愿死来得快一点,再见了!”

偶尔女人们会在脱衣时突然发出最恐怖的尖叫,或撕扯自己的头发,像疯子般喊叫,这些人会立即被带到楼后用小口径步枪从脖子后面击毙。

有时,当特别分队的人离开毒气室,女人们会突然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会把所有能想到的诅咒倾泻在我们身上。

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门要被关上的那一刻,一个女人试图把她的孩子推出毒气室,她抽泣着叫喊:“至少让我的宝贝孩子活下去吧!”

许多这样令人发抖的场面,震动了所有目睹的人们。

1942 年春,在“别墅”果园开满鲜花的果树下,成百上千精力充沛的男人和女人毫不怀疑地在毒气室里走向了死亡。这幅生命中的死亡图景直到今天仍刻在我脑海里。

在站台上进行挑选的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家庭的破裂、丈夫与妻儿的分离带来巨大震动,将焦虑不安散布在所有人中间。劳动力被分出去后,不安进一步增加。每个家庭都希望付出一切代价待在一起,被选出的人又跑回去和家人在一起 带孩子的母亲试图回到丈夫身边 老人寻找自己已被带走的被选做劳动力的孩子。

经常地,因为场面过于混乱,挑选不得不重新进行,等候室的有限空间不允许更有条理的挑选工作。所有平息激动人群的企图都无济于事,经常需要武力恢复秩序。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犹太人有深厚的家庭情感,他们像帽贝(一种贝类动物)那样紧紧粘在一起,但根据我的观察,这种联系缺乏坚固性。你可能认为在这种情形里,他们绝对会互相帮助、互相保护,但事实不是如此。

特别分队队员的态度也很奇怪,他们都很清楚,活动一结束,他们也会遭遇与他们曾极力迫害的同族完全相同的命运。然而他们完成任务时的急切令我惊讶。他们不但从来没向受害者泄露过逼近的命运,在脱衣时还耐心帮助他们 而且做了充分准备对付那些不听从的人。

尸体必须从室内运走,头发剪掉,金牙拔掉之后,尸体被拖进壕沟或焚化炉,然后点燃壕沟里的火,将多余的脂肪慢慢烧干,燃烧的尸堆必须不断地翻个儿,以便通风,使火焰更旺。

特别分队麻木不仁地执行着这些任务,似乎那只是普通的日常工作。他们在拖尸的同时,也吃东西或抽烟,甚至在做恐怖的烧尸工作时他们也不停止吃东西。

特别分队的犹太人在尸堆里碰到至亲尸体的事情一再发生,甚至在走进毒气室的活人当中也会遇到。这显然令他们震动,但从未发生过任何意外。

我曾亲眼见到这种事。一次,当尸体从毒气室被送到焚烧沟时,一个队员突然停下来,站了一会儿,仿佛在那儿生了根,然后继续和同伴拖尸。我问队长发生了什么事,他解释说尸体是那人的妻子。我注视了他一会儿,但没看出一丝异样。他继续拖尸,像之前一样,我过了一会儿视察分队时,看到他正和别人坐着吃饭,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是他真能如此彻底地隐藏自己的感情,还是他已过于残忍,不在乎这个或是另有原因?

从何处来的力量支撑特别分队的人日以继夜地埋头于骇人的工作 难道他们还指望幸运意外降临,在最后一刻把他们从鬼门关夺回来 或者他们已经因日积月累的恐怖而变得麻木,甚至不祈望结束自己的生命,逃避这种生存 我仔细地观察过他们,但从未真正理解他

们的行为。犹太人生和死的方式是个真正的谜,我从未破解。

我叙述的所有这些体验可以重复许多遍,它们只是从整个庞大的屠杀中截取的点滴片段。

据我所知,这次大屠杀及伴随而来的氛围,并非对参加者没有影响。几乎所有参与这项恐怖工作和这种服务的人,还有像我这样认真思考过此事的人,都被这些情景深深震动。

在我巡视集中营时,许多卷入其中的人接近我,倾诉他们的焦虑和印象,希望我能安慰他们。

在这些秘密谈话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问及: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必要?成千上万的妇女和孩子被杀是否必要?我内心深处也曾在无数个场合问自己这个问题,却只能搪塞过去,一遍遍重复:一切都是为了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我同时不得不告诉他们,屠杀犹太人是不得已而为,只有这样德国和我们的后代才能永远地从他们无休无止的敌对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在我们任何一个人心里,希特勒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而且执行命令是党卫军的职责,然而我们都因深藏内心的疑问而痛苦不堪。

每个人都注视着我。他们观察着上述场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和我的反应,我关于这件事说的每个词都被认真讨论。我不得不拼命地自我控制,不让自己内心的怀疑和压抑的情感流露出来。

面对那些定会使任何一个有人性的心灵痛苦的场面,我必须显得冷酷,无动于衷。在恐惧时,我甚至不能移开视线以免我自然的情感占了上风。在母亲们带着欢笑或哭泣的孩子走进毒气室时,我必须冷漠地看着。

一次,两个小孩太专注于一个游戏了,不让他们的妈妈把自己拉

开,就连特别分队的人也不愿把他们带走。那位母亲明白要发生什么,她眼里乞求的神情令我永远无法忘记。毒气室里的人们开始焦躁起来,我必须采取行动,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向执勤的下等军士点头示意,他们用胳膊夹起哭叫挣扎的孩子,把他们送进了毒气室,那位母亲痛彻心肺地抽泣着跟了进去。我的歉意是如此深重,我渴望自己从这个场面中消失,然而我不能显露一丝情感的痕迹。

我不得不观看一切,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注视,尸体搬运、火化、拔牙、剪发,整个恐怖的没完没了的屠杀。我必须在可怕的恶臭中连续站上几个小时,亲眼看着巨大的坟墓被打开,尸体被拖出来烧掉。

我必须从毒气室的窥视孔里注视死亡的过程,因为医生要我看着。我必须做这一切,因为我是众人瞩目的一个,因为我必须向他们表明,我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发布命令、制定纪律,我自己随时准备完成我布置给下级的任何任务。

元首派了大量纳粹高级领导和党卫军官到奥斯维辛来,让他们亲眼看看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他们都被看到的一切深深触动。有些先前极力鼓吹屠杀之必要的人,一旦真的看到"犹太问题的最后解决"就陷入了沉默。我一再被问及,我和手下人怎么能一直观看这些操作,我们怎么能够忍受得住。

我永远不变的回答是:要获得执行希特勒命令必须具备的钢铁意志,只能扼杀所有作为人的情感。这些绅士们都宣称,很高兴这种工作没落到自己头上。没有一个人羡慕我的工作。

就有关"最后解决"的所有事情,我和艾克曼[①]有许多详细讨论,但没有泄露我内心的焦虑,我用尽所有办法去探索艾克曼内心深处对

① 纳粹主要战犯之一,指挥了对 600 万人犹太人的屠杀。

这一解决的真实想法。

是的,所有办法。然而,即便当我们单独在一起,酒已随意灌下,他的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他仍表示他完全被毁灭每个能抓到手的犹太人的主意给迷住了,我们必须尽快完成这次屠杀,不带怜悯,无动于衷。任何退缩,即使是最微小的,日后都必将遭到严酷惩罚。

面对如此冷酷的决心,我被迫将自己作为人的感情尽可能地深深掩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